

外国研究中国

1

WAIGUO YANJIU ZHONGGUO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外国研究中国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内部发行

外国研究中国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8 1/4 印张 165千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17·207 定价: 0.77元

编 者 的 话

为了解国外研究我国的情况，我们编印了这种《外国研究中国》资料集，分辑出版。资料集的内容着重介绍国外有关“中国学”的背景材料，如研究机构、学术队伍、会议、论著、基本概况和动向等。资料集中，有许多原始资料的观点是反动的、错误的，有些资料限于来源的条件，也比较旧，仅供有关单位内部参考和批判使用。希望读者对资料集的编辑和选材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进。本资料集的第一辑由我所一九七七年四——六月出版的原《国外中国研究》第一、二、三辑合并而成，特此附志。

一九七八年二月

目 录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法〕米歇尔·卢瓦	(1)
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苏〕B. C. 米亚斯尼科夫	(33)
苏修中国研究机构中的两种倾向·····〔日〕中嶋岭雄	(63)
美国研究中国的主要机构和人物概述·····	(66)
美国学术界强调研究中国·····	(97)
美国中国学中的“新左派”·····〔苏〕B. B. 麦德维杰夫	(109)
七十年代的任务·····〔美〕费正清	(113)
英国中国学概况·····〔苏〕B. H. 尼基福罗夫	(129)
今天的西德中国学·····〔苏〕B. H. 尼基福罗夫	(134)
东德的中国学研究·····〔东德〕R. 费耳贝尔	(142)
波兰东方学现状·····〔波〕维托尔德·铁廖赫	(166)
在香港的研究中国的情报资料机构·····	(171)
苏联中国学图书馆·····	(180)
第二十九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	(183)
第二十三、二十四届国际中国学家大会·····	(185)
近年来苏修召开的反华“学术讨论会”·····	(188)
李约瑟及其中国科技史研究·····	(197)
费正清·····	(207)
费德林·····	(226)

• 书讯 •

《毛泽东与教育：他的思想和教导》·····	(229)
美国出版中国人名辞典 ·····	(231)
苏联出版《苏联东方学家人名著作辞典》·····	(232)
苏联出版文摘杂志《东方学和非洲学》·····	(233)
法国出版宋史研究丛书 ·····	(234)
西德出版《金史研究》·····	(235)
最近十年苏联出版的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问题的图书 ·····	(236)

《实践论》法文版前言

〔法〕米歇尔·卢瓦

编者按：米歇尔·卢瓦 (Michelle Loi) 原任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东方语言文明系研究员，现任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目前她从事鲁迅著作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她还从事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研究。1971年9月，她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曾来我国访问。这篇《实践论》法文版（巴黎奥皮耶·蒙旦书店1973年出版）前言，曾在1970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中国学家大会上宣读过。现将该文摘译如下：

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都是一种哲学“实践”，是一种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并正在改造世界的认识论。然而，可以无可争辩地说，正是《实践论》给我们提供了那种深刻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全部著作连成一体，并保证运用这种认识论的全部实践前后一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学习它，在工农兵中普及哲学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无疑是有其理由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从延安时代到现在，路线始终是那一条，这条路线曾被曲解、歪曲、遭到打击和否定。今天，在这条路线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中，群众的哲学论文表明，路线

仍然是这一条。还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甚至文章的作者以及最有权威的中国评论家都认为，《实践论》是这两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实践论》的写作早于《矛盾论》一个月，是抗日学院（抗大）第一堂二小时课程的教材，《矛盾论》则是第二课，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作者的意图和他所遵循的逻辑了。西方的知识分子们比较喜欢第二篇文章，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理论性更强。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对没有先写这篇文章感到奇怪：既然这篇文章更具有普遍性，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从根本上也处于优先地位。但是有一位评论家说得有理：《实践论》之所以优先于《矛盾论》，这正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一书中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用他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的话来说，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甚至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后一种方法（即从一般到具体）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在科学的方法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也同在读《实践论》时一样，自然应该注意不要产生路易·阿尔蒂塞尔所指责过的那种误解（费尔巴哈等人就是这样的），把实在的具体同精神上的具体混为一谈。……来源于从特殊到一般，从实在的具体到精神上的具体这一运动的认识，并不停留在理论的阶段上，而是象毛泽东本

人所说的那样，只有通过“回到客观世界中去”产生精神上的具体，来证明它的实际价值。精神上的具体总是比实在的具体丰富得多。他说，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只有在这时，即产生了精神上的具体以后，认识才努力寻找“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但是，这第二个阶段，即《矛盾论》的阶段，只有通过《实践论》中提出的在实践和认识之间的辩证运动才可能达到。另一方面，这两篇文章写作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也使这两篇文章首先反对目的在于阻挠认识的辩证过程和使革命运动停滞不前的先验论、经验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这两篇文章的目的在于，在党内的空谈家和机会主义分子刚刚使革命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但还在继续玩弄公式而不是正视现实的时候，更快地并尽可能更广泛地传授一种生动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实践论》应该先写出来，也宜于先学。

*

*

*

1937年7月。经过了十六年的斗争、失败和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他的部下在陕西红色根据地的中心延安安顿了下来。但是，如果说领导权易了手，那条被否定了的路线却仍然存在。这条路线还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拿王明来说吧，他在1937年底从苏联回来的时候还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联络委员会。对于毛泽东来说，王明及其一伙被称之为“强硬派”的这些人，满脑子书本知识，“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只不过是一些“学舌的鹦鹉和留声机”，不可能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

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与此同时，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同他们相反，经验主义者“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然而，抗日战争就在这个月的七号爆发了。组织对入侵者的有效抵抗，和用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武装来到延安和他的抗日学院（抗大）的年轻干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路易·阿尔蒂塞尔说：“那时（1902年），他反对那种跟着群众的‘自发性’跑的机会主义政策；他要把这种政策转变为建立在‘理论’，即特定社会（当时的俄国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础之上的革命实践。但是，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列宁所作的超出了他所讲的：在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实践需要有‘理论’基础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有利于理论的论点，这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实践的理论：唯物辩证法。”这正是毛泽东在1937年所做的工作。那时，他引用了列宁的这一句话，同时还加上他自己的一句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建立了抗大，就是为了赋予它这个“灵魂”，即一种正确的理论，这种理论使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战士得以免受那些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另一些自封为政治上的专家却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自命不凡的学究们，以及那些竞相嘲笑这位跑来讲哲学的农民的外国留学生的影响。然而，这些跑到延安来投奔毛的青年人，这些未来的干部们，他们只有满腔的热情，文化程度却非常之低。他们中不少人是文盲，那些不是文盲的人也从来没有读过一篇理论性文章，即

使读过，他们又怎能比那些来自莫斯科的“专家”们懂得更多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呢？读哪些？（翻译过来的很少，根本没有纸张！）时间却很紧迫！1960年，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过，他之所以用这种形式写这两篇论文，引用了一些中国的具体例子，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党的需要！因此，他不是以哲学家的身分，更不是以“舵手”的身分，而是以教员的身分开始写作的。“舵手”这个称号他是一直不同意的；他在1971年还对埃德加·斯诺说过，他所愿意保留的唯一称号是教员。而他用自己的语言教授的，就是革命的理论。1937年在延安审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措施和目标以前，应该在当时的政策实践中运用辩证法的理论阐述。如果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列宁的若干篇文章为依据，这怎么会是偶然的呢？列宁在这几篇文章里首次提出了辩证法，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大文章里还没有提到过。路易·阿尔蒂塞尔认为，《矛盾论》“在1937年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政治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设想。这个看法也适用于《实践论》，而且首先适用于《实践论》。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当时是否出版过，这一点我们毫无所知，因为一份也没有保留下来。最早为人所知的，就是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和《选集》第一版第一卷上的那一篇。没有人能肯定，这篇文章曾经修订过，除非象对《矛盾论》那样，有某一位（如果有这种事的话）抗大的老同学记得还有用来更充分地说明某一个论点的另一些例子。有一位评论家在仔细研究了1937年的

这两篇哲学论文和同时期写的其它文章里用来说明“思想”这个词的各种不同的术语以后推断，如果毛泽东在1950年修订过这篇文章的话，可能在写这篇文章时在更大的程度上没有依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正式书目，因而，和苏联人相比，特别是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他的论点有其独到之处。斯大林的这本书是在1939年写的，1942年译成中文，其中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也没有直接从中加以引用。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同样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实践论》（《矛盾论》也一样）没有收在1950年以前出版的选集里，例如1939年出版的选集。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直到1950年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一篇文章的价值，因为这篇文章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而应该说，正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一点，所以当和平重新来到，他能够从容地选择他的文章而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的时候，他就把这篇文章收进选集里了。这时，这位延安的教员就把他的听众扩大到了全中国。不论他的路线在以后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或遭到了什么样的暂时挫折，《实践论》始终是他战斗的首要武器，如果没有这个武器，就会一事无成。形式生动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包含任何杂质；不论它的敌人想出什么新的花招，唯物主义也不会变成机械论，因为它是绝对地辩证的，而辩证法也不会消失在形而上学的乌云之中，因为它是彻底地唯物的。简言之，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革命的精神。

*

*

*

世界分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和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世

界。毛泽东是从仔细地、透彻地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不可能懂得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同他们相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强调知和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这一点以反对唯心主义。即使是辩证的，唯心主义也是把认识和他的物质基础割裂开来的。认为物质环境引起感觉的变化并到此为止，这就是机械唯物论。认为思维的变化引起物质的变化，这就是唯心论。辩证唯物主义则尊重从物质到思想，又从思想到物质这一往复无穷的运动，这种运动就构成认识的产生过程。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分析了事物的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必然使思想和实际经常对立，必须经常重新加以检验。在《实践论》一文中，他分析了“社会实践”这个概念。既然社会实践是从行动到思想又从思想到行动，即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的互相转化的场合，这个概念就尤其重要了。按照路易·阿尔蒂塞尔的定义，只要通过一般的实践，人们就能理解“一定的原料经过一定的人的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而转化为一定的产品这一转化的全过程”。他还说：“在这样设想的全部实践中，过程的一定时刻（或成分）就既非原料也非产品，而是狭义的实践，是人、工具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技术方法在某一特定的结构中进行活动的转化劳动的时刻本身。”因此，有各种实际上完全不同的实践，尽管它们都有机地属于同一复杂的整体——“社会实践”。毛泽东在列举这些不同的实践时，把“目的在于解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放在首位。我们将会看到，他虽然没有坚持，但还是强调，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因此，这种

作用可以是比较直接的或者不是那么直接，从中获得的认识也可以是比较正确的或不那么正确。在社会实践的其它形式中，人们认识了解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就是了解物质生活，因为前者和后者是“紧密相连”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在一定的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使用了“烙印”这个词；烙印就是一个伤痕，一种用火烫成的记号，因而是一种不能磨灭的东西，即使痊愈了也无法否认的东西。在当前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和思想改造的问题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把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这些社会实践称之为“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我们知道，后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它们又被归结为“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总是在直接的生产斗争之外）。因此，似乎毛泽东早就（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把艺术活动首先列入阶级斗争之中〔其次才列入科学活动之中，既然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活动也要求寻找本身的技术手段〕，并且总是把政治放在“挂帅”的地位上，因为“一切艺术都是为阶级服务的”，不是暗暗的就是公开的。第三种社会实践科学实验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科学实验找出规律，发展理论，从而可以掌握世界。根据当前对“哲学”的研究，哲学显然不能同科学试验混为一谈，科学实验只是哲学的一把“钥匙”，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而且是一种不能取代的“实践”。这就是辩证唯物论。

由于没有这种方法，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至今未能发展应该与之相适应的认识。但是，这种方法，即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在无产阶级诞生以前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实践受

到限制，另一方面（在毛看来，这是首要的）是因为“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路易·阿尔蒂塞尔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保证再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因此，辩证唯物论就是毛泽东的哲学，它“公然申明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它“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在谈了辩证法的法则，即人的思想在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往复运动之后，毛泽东按照列宁的路线：“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首先把重点放在实践上，因为实践总是从占首位的（用路易·阿尔蒂塞尔的话来说是“总是现成的”）现实中产生出认识来的。等到他认为所有的听众都同意了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后，他就立刻转到了可能引起的曲解上去，举出了这方面的一些现实的例子。最严重的例子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们忘记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忘记了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因为他不愿仅仅满足于肯定这一点，因此他在这篇论文最出名的部分分析了认识发展的过程，以便更好地抓住这种过程被曲解的时机。

实践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感觉和印象”，以及这些感觉和印象在脑子里产生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毛用到延安来考察的一个代表团的最初印象来说明他的理由。这就是感性认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造成一种思想、一些概念还是不可能的。但是，进一步的实践积累了由感性认识所产生的结果，到了一定的时刻就会产生一个认识上的“飞跃”。“飞跃”这个词比常用的“跃进”这个词强烈得多，尤其因为这个词能更好地说明思想上的断续性。在中文里就是用这个词（从

这篇文章开始?)来表达质的突变的,我们则根据巴歇拉尔和阿尔蒂塞尔的说法称之为“突破”。这就是联结各种孤立的现象、抓住内部的联系并能进而推理出合乎论理的结论的概念的出现。毛接着举出一个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例子,归纳了他前面所叙述的关于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过程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的分析。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他没有提到第三种社会实践,即科学试验,无疑是因为科学试验需要另外两种社会实践的成果才能进行,或者换个说法,因为科学试验是在另一次“飞跃”过程中以另两种社会实践为目的的实践。合乎论理的认识的确是一种高一级的认识;毛泽东引用了列宁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所说的关于抽象的话:抽象“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如此分解开来的“过程”,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联结物正是实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作者的思想里,实践是飞跃的场所,是思想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转移的联结物或场所(毛后来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称之为“熔炉”^①),因为他接着就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那末,不管怎样,实践却可以解决这两者。因此,实践是第一位的,“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由此可见,实践,即“生活于”资本主义

^① 毛主席原文为“经过实践的考验”,法文译为“通过实践的熔炉”,此处是按法文译的。——译注

社会，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如果马克思一开始就拒绝了这种实践，那末，即使他的天才再大，也不可能发现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也可以这样说：他的天才就在于“懂得了这种实践的必要性”）。在辩证唯物论的创建中继承马克思的人们“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相反的，中国传统的小知识分子秀才却认为，不出门就可以知道一切。这一切批评所指的秀才还是有的，我们不再怀疑这一点，既然毛泽东借用了湖南方言里“知识里手”这个词来进行抨击。他们自以为是“天下第一”，但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他们是最愚蠢无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只有实践才能变革现实”，“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吃一吃”，按字面来说是变革梨子。“变革”这个词几乎是无法翻译的，很有分量，有力地表达了质的变化的突然性和复杂性。在回答一种反对意见时，毛承认，不仅有直接的经验，还有古人和外国人的经验，这些经验往往是别人的直接经验，显然也不应忽视。对于我们来说，非直接的经验也应该纳入亲身实践的过程中去，以检验其是否依然正确（过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曾经科学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拿一位农民哲学家在评论这一段落的话来说：“如果光是别人吃了梨子，你怎么会知道梨子的滋味呢？”

因此，他们的错误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错误是相同的。那时，还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毛泽东用中国的例子来说明如下的辩证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实践通过“飞跃”而造成关